

超大城市流动儿童社会性生存风险分析及干预路径

——基于宏观系统视角

李 雪

杭州师范大学经亨颐教育学院, 浙江 杭州

收稿日期: 2024年5月30日; 录用日期: 2024年6月30日; 发布日期: 2024年7月9日

摘 要

本文基于生态系统理论视角, 重点探讨超大城市中流动儿童面临的宏观系统层面社会性生存风险, 并提出相应的干预路径。研究发现, 超大城市中流动儿童面临的宏观社会性生存风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第一, 政策层面的限制, 表现为入学门槛的提高和异地升学的困难, 这直接影响流动儿童的教育机会获得, 并间接影响家庭对其教育的期望和策略。第二, 社会观念层面的隔阂, 包括社会对流动儿童普遍存在负面刻板印象, 以及本地居民出于资源竞争意识产生的排外情绪, 这不利于流动儿童的城市融入和身心发展。针对这些问题, 本文提出了两方面的宏观干预路径: 一是政策层面, 应提升流动儿童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 平衡教育资源配置。二是社会观念层面, 应促进社会对流动儿童的正面认知, 通过加强群际接触和交流, 建立更加包容和谐的城市氛围。本文揭示了超大城市流动儿童面临的独特社会性风险, 强调从生态系统的宏观视角理解和应对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关键词

流动儿童, 社会性生存风险, 宏观系统, 超大城市

An Analysis of Social Survival Risks and Intervention Paths for Migrant Children in Mega-Cities

—Based on a Macro-Systemic Perspective

Xue Li

Jing Hengyi School of Education,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Received: May 30th, 2024; accepted: Jun. 30th, 2024; published: Jul. 9th, 2024

文章引用: 李雪. 超大城市流动儿童社会性生存风险分析及干预路径[J]. 服务科学和管理, 2024, 13(4): 386-393.
DOI: 10.12677/ssem.2024.134048

Abstract

This paper, grounded in 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 focuses on exploring the macro-systemic social survival risks faced by migrant children in mega-cities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intervention path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major macro-level social survival risks encountered by migrant children in mega-cities stem from two aspects. First, policy-level restrictions, manifested as heightened barriers to school enrollment and difficulties in pursuing education in a different location, directly affect migrant children's access to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and indirectly influence their families' expectations and strategies regarding their education. Second, social perception gaps, including the prevalence of negative stereotypes towards migrant children and the exclusionary sentiments of local residents arising from perceived resource competition, hinder migrant children's integration into the city and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this paper proposes two macro-level intervention paths. First, at the policy level, the socioeconomic status of migrant children's families should be elevated, and the alloca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should be balanced. Second, at the level of social perceptions, positive recognition of migrant children should be fostered by strengthening intergroup contact and communication, thereby establishing a more inclusive and harmonious urban atmosphere. This paper unveils the unique social risks faced by migrant children in mega-cities and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understanding and addressing this issue from a macro-systemic perspective within the ecological framework.

Keywords

Migrant Children, Social Survival Risks, Macro-System, Mega-Cities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背景

根据 2020 年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流动儿童的数量已经达到 7109 万, 占有所有儿童群体的 23.9%, 也就是每四个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处于流动之中。相较于 2010 年的 12.8%, 增长了近一倍[1]。流动儿童的生活境遇一直备受关注, 伴随着政府实施的一系列措施改善流动儿童的教育和生活环境的政策措施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 流动儿童的物理生活条件已经得到明显改善。但户籍系统依然是公共教育资源分配的核心因素, 尤其是在超大城市人口过剩的背景下实行的人口疏解策略, 使得超大和特大城市流动儿童的入学升学问题依然未能得到充分解决, 入学升学的限制和频繁的迁移对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影响尤为显著。使该群体面临着更为典型的“社会性生存风险”。庄友刚[2]的研究中首次提出“社会性生存风险”这一概念, 主要指社会关系发展中的负面影响。这一概念为理解流动儿童群体面临的困境提供了新的视角。艾志杰[3]指出,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 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 但由于户籍制度等体制障碍, 他们在城市中面临着社会融入困难、公共服务可及性不足等问题, 处于“半城市化”的尴尬境地, 这反映了农民工群体面临的典型社会性生存风险。周佳[4]的研究进一步指出, 作为被动流动群体的青少年在身份认同、社会归属等方面遭遇困境, 面临严重的社会性生存风险, 需要通过自我建构来应对。这些研究表明, 社会性生存风险已经成为理解流动人口, 特别是流动儿童发展困境的重要概念。

基于以上研究,社会性生存风险可以理解为个体或群体在社会关系、结构和功能等方面遇到的风险,可能威胁到个体的社会地位、参与、认同和支持等关键方面。对于流动儿童群体而言,社会性生存风险主要体现在更为有限的教育机会获得和更加困难的社会融入过程[5]。作为“被动流动”主体的流动儿童面临的社会性生存风险,加剧教育领域中的“马太效应”,即资源丰富者得到更多,而资源匮乏者则处境更加困难。这不仅阻碍了社会的流动性,也增加了阶级固化的风险[6]。因此,深入研究流动儿童面临的社会性生存风险,对于促进教育公平和社会流动具有重要意义。

2. 理论分析

生态系统理论强调个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认为个体的发展不仅受到其直接环境(如家庭、学校)的影响,还受到更广泛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布朗芬布伦纳把影响个体发展的外部环境视为一个生态系统,并将其细分为微系统、中系统、外系统和宏系统[7]。其中,宏系统处于最外层,指的是更广泛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观念,对个体发展具有深远影响[8]。

在流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宏观系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超大城市独有的入学政策限制,例如户籍、社保、积分、购房等要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流动儿童的教育机会和质量。同时,社会文化观念中对流动儿童的刻板印象也限制了他们在学校生活、人际交往方面的机会。这些宏观因素构成了生态系统内层社区交往、学校接纳、家校合作以及同伴交往的重要背景,对流动儿童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此外,布朗芬伦纳还强调系统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和相互影响。对于宏观系统来说,教育政策直接影响学校的运作(中观系统)和家庭的教育决策(微观系统);而社会观念则通过影响个人态度和行为(微观系统)进而影响人际交往和社区融合(中观系统)。因此,在分析宏观系统的同时,也要关注它与其他系统之间的动态互动,以全面理解流动儿童面临的社会性生存风险。

2.1. 看得见的制度壁垒: 政策限制

1) 超大城市中流动儿童实际入学难度在增加。自 2001 年起,流动儿童入学主要依据“两为主”、“两纳入”政策¹[9]。但是,在实际操作上,不同规模和层级的城市关于入学门槛,呈现结构性差异。2014 年国务院实施了户籍制度改革措施,彻底取消了对建制镇和小城市的落户限制,同时对人口超过 500 万的特大城市实施了严格的人口规模控制。在此背景下,针对流动儿童的入学,中小城市正逐渐放宽政策,而特大城市则有所提高[10]。有研究显示,我国城市的流动儿童的入学友好度排名为:常住人口 300 万以下的城市入学环境最为友好,其次是 500 万至 1000 万人口规模的城市,1000 万以上的大城市则相对不那么友好[11]。以北京为例,自 2014 年起,北京市对随迁子女入学的证明材料提出了严格要求,最初要求提供“五证齐全”,包括实际居住证明、务工就业证明、户口簿、居住证和无人监护证明等。不同区域的具体要求不一,有时家长需准备逾三十份材料。到 2019 年,无人监护证明被取消,要求变为“四证齐全[12]”。然而,流动人口主要集中于传统服务业和传统第二产业,如餐饮服务、零售和建筑业等[13]。对于这些人群而言,获取务工就业证明和实际居住证明尤为困难。另外有研究发现,近年来虽然北京市对一些非京籍人口子女的入学流程和条件进行了简化,但对务工就业证明和居住地证明的审核要求实际却越来越严格[14]。如果无法满足本地公立学校的入学条件,家长们可能会选择民办学校。但随着北京城市化进程加快和教育资源的优化调整,大部分面向外来务工家庭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已经关闭或转型。同时,北京市规范的民办学校往往收费高昂,对普通外来务工家庭而言难以负担。这种情况下,非京籍儿童或子女在北京入学的难度实际上在增加。

从数据上看,在超大城市学校就读流动儿童数量也确实在减少。自 2014 年起,北京、上海等特大城

¹要求以流入地政府为主、公办学校为主,来接纳随迁子女义务阶段的教育;流入地政府在制定教育规划及教育财政预算时,必须把随迁子女纳入进来。并以居住证作为随迁子女入学的主要凭证,以法律形式保障他们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市为治理“大城市病”，实施了严格控制城市人口规模的政策。这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流动人口成为主要的“被疏散”群体。而特大城市可能也将适当提高入学门槛来作为疏解人口的一项措施，在人口疏解政策实施后的几年间，北京的非京籍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人数从2013年的47.31万减少至2020年的31.28万[15]。同样作为超大城市的上海，纳民学校²的学生总数也呈现下降趋势，从2008年的17万降至2015年的9.8万、2017年的6.2万，以及2019年的4.9万[16]。

2) 流动儿童异地升学面临着更为艰难的境遇。尽管国家政策强调保障每个学生的义务教育和升学考试权利，并鼓励各地政府制定相关政策，但实际执行中仍然困难重重。在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和广东，异地中高考的准入通常取决于外来务工家庭的社会经济水平、是否有当地户口，以及监护人的社保缴纳年限或积分等因素[17]。许多农民工和进行自主经营的小商户家庭，他们的孩子们因父母无法缴纳社保而无缘在居住地城市参加中高考；而即便家长拥有高等教育学历和稳定缴纳社保的工作，但在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获得户口仍非易事，其子女升学同样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此外，即使流动儿童满足了异地升学的要求，其教育选择的范围往往受到严格限制。在中考阶段，像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通常只为随迁子女开放中等职业学校的升学机会，而如重庆、福建等地的优质高中则通常不向随迁子女开放[17]，这些政策从实质上进行了教育水平的分层。

面对大城市的户籍与教育政策的限制，许多流动儿童在升学关键时刻不得不选择回到老家继续学业，这导致了一种“回流”和“再留守”的现象。有研究表明，随着随迁子女进入更高年级，他们成为留守儿童的可能性增加，特别是在那些异地中考要求更为严格的城市，这一趋势更加明显[18]。异地中考门槛不仅直接降低了随迁子女的高中入学机会，增加了他们返乡留守的可能性，且对他们留守后的高中升学率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尽管随迁子女回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升学，但由于新环境适应不良、教材衔接及教学方法的差异、失去父母陪伴、教育期望降低以及原有的社交关系网络断裂等原因，他们回乡后进入高中的概率实际上更低[19]。可见，超大城市升学和入学的高门槛，是在实质上增加了流动儿童成为处境更为不利的留守儿童的概率，同时降低了流动儿童继续接受更高等教育的机会。

3) 宏观政策限制影响微观家庭教育期望。入学和升学政策的限制直接构成了对随迁子女教育机会的排他性障碍，同时也通过改变家庭对教育的期望和策略间接影响孩子的未来。实证调查表明，面对大城市的异地升学政策，流动儿童家庭的教育参与度明显下降，政策限制越严格，父母的教育期望下降越明显。除了教育期望的调整，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学习交流也减少，尤其在直接受政策影响的家庭中更为常见。[20]但这并不意味着父母对孩子教育的忽视，而是更多表达了他们对孩子未来道路的担忧和不确定性。面对教育政策的限制，流动儿童家庭为了让孩子继续接受教育，不得不投入更多资源，却常常面临不如预期的结果。对流动儿童而言，从幼儿园到高等教育的标准教育轨迹充满阻碍，迫使一些家庭选择非传统的教育路径，比如民办幼儿园、打工子弟学校或职业学校，或是放弃追求更高学历。不仅需要更多的经济支出，而且教育质量也常引发担忧[21]。因此，一些父母持更保守或低预期的态度看待教育投资的回报，有时这种态度转化为让孩子随遇而安、“走一步看一步”的教育态度，忽视了发掘和培养孩子潜力的重要性，可能进一步限制孩子的未来发展空间[22]。

2.2. 看不见的文化藩篱：社会观念

1) 社会对流动儿童抱有负面的刻板印象。李普曼指出，刻板印象是一种固定的观念或看法，涉及某一群体成员的特征及其成因，它是人们特定的社会认知图式，一种简化社会群体区分的方式[23]。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解读刻板印象的产生，人们面对不熟悉的事物或群体，总是倾向于使用心理上的启发式

² 纳民学校，指的是上海2008年启动的一项包容性教育政策实验——将外来务工子弟小学“纳入民办教育管理体系”。这是纳民学校名称的由来。

判断作为快速认知和评价的方法[24]。这通常导致社会对流动儿童的看法是基于以往的经验或社会舆论,而非针对他们个体的深入了解。二十多年来,大量研究和报道聚焦于流动儿童及留守儿童的问题和缺陷,强调其焦虑、孤独、自卑感以及行为问题、低自尊心和学业投入不足等负面现象[25]。此外,媒体对农村居民形象的负面描绘也加剧了这种刻板印象的形成。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社会中对流动儿童的负面刻板印象,给整个群体贴上了如学习习惯不佳、个人素质低下、性格孤僻或易怒的标签[26]。这种刻板印象可能影响部分本地户籍家长的态度,使他们对流动儿童持有一定程度的偏见,并影响他们让自己的孩子与流动儿童交往或共同学习的意愿。2018年发生的“苏州隔离墙”事件³便是这种社会偏见的明显例证。

心理学中的自证预言现象揭示了刻板印象对流动儿童负面作用。自证预言是指个人或集体的期望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人的行为,从而导致这些期望成真[27]。即当流动儿童感受到这些刻板印象的压力时,他们会在行为上不自觉地验证这些消极的预设。这不仅加剧了他们对这些消极印象的接受和内化,而且可能会降低他们的自尊和自我效能感。自尊的降低对他们的身心健康和社交能力的发展极为不利;同时,自我效能感的下降也会削弱他们对学业的信心,进而影响学习表现,导致学业倦怠[28]。

2) 超大城市中出于资源竞争意识的排外情绪。在资源竞争背景下,社会群体往往在社会内驱力和压力的双重作用下,强化了自身与他者的差异性,形成了一种认同感和归属感。这种群体认同进一步导致成员在互动中展现出对内群成员的偏好和对外群成员的排斥,进而在无意识中将有利资源视为内群的特权[29]。资源竞争理论也指出,族群符号常被作为社会竞争的工具,人们在特定社会环境下,会以族群为单位组织起来,争夺各种资源,从而构建族群间的社会边界[30]。对于一些特大城市的本地户籍居民而言,外来人口会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教育、医疗、就业以及居住空间等公共资源的竞争对象。尤其是在北京、上海这类教育资源相对集中且公众印象上具有“升学优势”的城市,当户籍和入学政策有所放宽时,会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本地居民的利益[31]。2012年上海的“占海特事件”⁴中,沪籍家长对占海特争取异地中考权的反对[32],正是基于资源竞争意识产生排外情绪的具体体现。不当或过激的排外情绪加剧了群体间的对立,使得无形的“隔离墙”依然高筑。

由户籍制度产生的流动和城市儿童群体显现出鲜明的群际属性[26]。根据群际接触理论,通过增加不同社会群体成员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可以促进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与认识,有助于缓解群体间的紧张关系,并推动更和谐的社会融合[33]。然而,在实际的社会环境中,“偏见”和“排外情绪”导致的两个群体间的隔离,实际上是一种反群际接触的现象,不仅抑制了群际接触的正面效应,还可能引发并加剧群体间的冲突和对立,对流动儿童的城市融入产生不利影响。此外,当流动儿童感受到来自主流社会的排斥或歧视时,可能会在心理上形成自我防卫机制,这有时会导致他们展现出逃避、消极或其他不利于个人成长和社会适应的行为模式。这种现象反过来又可能加强原有偏见,形成一个难以打破的负面循环。

3. 干预路径

综上所述,超大城市流动儿童面临的社会性生存风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获得教育机会方面,由于户籍和升学政策的限制,他们在入学和升学时往往处于不利地位,难以享受到均等、优质的教育,这直接影响他们的未来发展。二是在社会融入和人际交往方面,由于社会观念中的刻板印象和排斥情绪,他们常常被贴上负面标签,遭受偏见和歧视,难以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和社会支持网络,产生被边缘化的感受。这两方面因素相互影响,共同塑造了一个不利于流动儿童健康成长的社会背景。从生态

³2018年9月,苏州以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为主的民办小学——立新小学因校舍被腾退,800多名学生将被整体安排到附近的公办重点小学、百年名校勤惜小学。引发该校学生家长的不满。8月23日,勤惜小学校长及苏州市姑苏区文教委透露,虽然共用一个校园,但会用铁栅栏等加以“隔离”,对安置学生进行“单独管理”,并给予独立的教学和活动空间。

⁴户籍江西的占海特2002年随父母移居上海,完成9年义务教育。由于无上海户籍且不满足中考条件,她面临只能在上海考中专/职业技术学校或返回原籍考高中的选择,因此主动辍学。2012年,她自称为“少年公民、自由战士”,在微博上积极争取异地中考权利,并与沪籍人士就异地中考“约辩”。

系统理论视角看，要从根本上改善流动儿童的处境，必须重点关注这两大风险，并从宏观系统层面寻求应对之策。

3.1. 政策层面

提升流动儿童家庭社经地位，平衡教育资源。正如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所强调的，知识的获取、生产乃至应用总是与权力、资源及格局紧密相关[34]。观察我国各地对流动儿童入学的政策，可以明显看出，无论是“积分制”还是“材料准入制”，政策似乎更倾向于那些经济条件较好、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5]。因此，针对流动儿童的支持措施，应特别关注那些社会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的流动家庭，从支援家庭做起，进而支持儿童[35]。

社会保障体系是提升流动儿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基础。首先，应完善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他们能够享受到与本地居民同等的医疗、养老等福利待遇。其次，应加强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就业援助和技能培训，帮助他们提升职业技能，实现稳定就业和收入增长。再次，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政策中，应适当简化积分项目和入学证明要求，降低准入门槛，以便更多流动儿童能够进入公立学校就读。

教育资源配置是促进教育公平的关键举措。在教育资源配置方面，应以常住人口为基准，制定公共服务和资源配置规划，增加学位供应[5]。对于那些积极吸纳流动儿童的公立学校，应当给予奖励和支持，鼓励更多学校向流动儿童敞开大门。对于具有发展潜力的民办学校，政府应加强指导和扶持，帮助其实现规范化升级，提升教学质量，为流动儿童提供更多优质教育选择。此外，政府还应加大对农村地区教育的投入，改善农村学校的办学条件和师资力量，从而为流动儿童及留守儿童在家乡就读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

区域协调发展是改善流动儿童成长环境的根本之策。长远来看，应着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大城市产业向周边中小城市转移，为流动人口在当地就业创造机会。对于那些具备承载更多人口能力的周边中小城市，可探索逐步放宽落户和升学限制，吸引更多流动人口在此定居。这不仅有助于缓解超大城市面临的人口压力，也为流动家庭提供了更多选择，使他们能够在更加宜居的环境中生活，享受更均衡的公共资源。通过推动区域均衡发展，能够从根本上改善流动儿童的成长环境，促进教育公平和社会和谐。

3.2. 社会观念层面

促进对流动儿童正面认知，建立更加包容和谐的城市氛围。我们应该以平衡、多元的视角看待流动儿童和外来务工人员，客观认识他们的生活现状和诉求。流动儿童随父母来到城市，寻求更好的教育和发展机会。尽管面临生活和学习上的各种难题，他们仍凭借勤奋和韧性努力学习，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外来务工人员为城市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理应获得尊重和认可。摒弃成见，以包容和欣赏的眼光看待这些群体，是构建和谐共融城市的必由之路。

媒体在塑造社会观念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新闻报道应秉持客观、公正的原则，全面、深入地呈现流动儿童和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状况，揭示他们面临的困境，表达他们的心声，唤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支持。同时，媒体也应注意挖掘流动儿童和外来务工人员的优秀品质和感人事迹，例如流动儿童在逆境中展现出的韧性和独立性，以及外来务工人员为城市建设做出的巨大贡献等，通过正面宣传，塑造流动群体的积极形象。

学校是培养青少年价值观念的重要场所。学校应将包容、平等、反歧视等理念融入教育全过程，引导学生尊重差异，欣赏多元。教师应以身作则，平等对待每一个学生，不因身份背景而区别对待。学校还可以开展形式多样的交流活动，如组织流动儿童与本地儿童结对互助、开展社区服务等，在共同参与

和互动中,增进学生之间的了解和友谊,破除隔阂和偏见。

社区是促进融合的重要平台。社区组织可发挥自身优势,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如举办文体比赛、节日庆祝等,吸引流动人口家庭和本地居民共同参与,增进感情,凝聚人心。社区还可成立志愿者队伍,为流动人口提供生活咨询、语言辅导、技能培训等服务,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

参考文献

- [1]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有限公司, 2021.
- [2] 庄友刚. 人的社会性生存: 风险社会的另一种理解——兼论当代空间生产与城市问题[J]. 山东社会科学, 2011(8): 13-17.
- [3] 艾志杰. 城市化生存的“社会性自我”建构——基于 21 世纪中国城市移民电影的分析[J]. 当代文坛, 2023(2): 152-157.
- [4] 周佳, 刁燕洁. 身份、锚点、归属: 流动青少年社会性生存的自我建构[J]. 教育学报, 2024, 20(1): 120-132.
- [5] 韩嘉玲.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我国流动儿童教育的新挑战[J]. 教育家, 2021(2): 13-15.
- [6] 王处辉. 警惕教育发展中的“马太效应”[J]. 人民论坛, 2020(6): 126-129.
- [7] 刘杰, 孟会敏. 关于布朗芬布伦纳发展心理学生态系统理论[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09, 17(2): 250-252.
- [8] Bronfenbrenner, U. (2000) *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37/10518-046>
- [9] 教育部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Z]. 教育部网站, 2022.
- [10] 论坛实录. 陈媛媛: 随迁子女升学政策改革与影响[Z]. 2023
- [11] 朱琳, 冯思澈, 马啸, 等. 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入学政策友好程度研究[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 [12] 第一财经杂志. “流动”儿童, 卡在城乡之间[Z]. 腾讯新闻, 2023.
- [13] 刘振, 戚伟, 刘盛和, 等.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就业行业选择分异及影响因素[J]. 地理科学进展, 2023, 42(6): 1055-1068.
- [14] 张眉. 北京流动儿童“幼升小”入学条件及其准备[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 [15]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北京统计年鉴——2021[Z]. 北京: 北京市统计局, 2021
- [16] 韩嘉玲, 余家庆. 离城不回乡与回流不返乡——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子女教育抉择[J]. 北京社会科学, 2020(6): 4-13.
- [17] 卢伟. 入学不易升学更难: 农民工随迁子女之教育困境及对策探讨[J]. 中小学管理, 2020(12): 13-16.
- [18] 陈媛媛, 邹月晴, 宋扬. 异地中考门槛与流动人口子女的留守[J]. 经济学(季刊), 2024, 24(1): 119-135.
- [19] 陈媛媛, 宋扬, 邹月晴. 随迁子女教育政策、入学机会与人力资本积累——来自异地中考政策的证据[J]. 劳动经济研究, 2023, 11(3): 3-29.
- [20] 王毅杰, 黄是知. 异地中考政策、父母教育参与和随迁子女教育期望[J]. 社会科学, 2019(7): 67-80.
- [21] 魏佳羽. 中国流动人口子女发展报告 2022[Z]. 2022.
- [22] 张佳伟, 徐瑛. 流动人口家庭教育适应策略的建构——以就读打工子弟学校的随迁子女家庭为研究对象[J]. 全球教育展望, 2020, 49(5): 32-42.
- [23] Lippmann, W. (2017) *Public Opinion*. Routledge. <https://doi.org/10.4324/9781315127736>
- [24] 戴维, 迈尔斯. 社会心理学[J]. 中国西部, 2014(10): 125.
- [25] 周皓, 荣珊. 我国流动儿童研究综述[J]. 人口与经济, 2011(3): 94-103.
- [26] 邹荣. 流动和城市儿童刻板印象的特点及其对群际关系的影响[D]: [硕士学位论文]. 重庆: 西南大学, 2012.
- [27] 杨丽萍. 社会化过程中预言的自我实现[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3): 91-94.
- [28] 黄则毓. 随迁儿童的刻板印象威胁及教育建议[J].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2023(15): 64-65.
- [29] 党宝宝, 高承海, 杨阳, 等. 群际威胁: 影响因素与减少策略[J]. 心理科学进展, 2014, 22(4): 711-720.
- [30] 关凯. 社会竞争与族群建构: 反思西方资源竞争理论[J]. 民族研究, 2012(5): 1-11, 108.

-
- [31] 郑赫南. 异地高考:“北上广”应如何破冰[N]. 检察日报, 2012-12-10(005).
- [32] 贺莉丹. “守沪者联盟”老崔:我为什么反对占海特? [N]. 21 世纪经济报道, 2012-12-14(002).
- [33] 李森森, 龙长权, 陈庆飞, 等. 群际接触理论——一种改善群际关系的理论[J]. 心理科学进展, 2010, 18(5): 831-839.
- [34] 米歇尔·福柯. 知识考古学[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 [35] 周佳. 防范困境儿童社会性生存风险叠加[Z]. 中国社会科学网, 2021.